本版编辑：沈　辉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418



教育视野

# 教育与受教育的问题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培养国家未来人才的重大使命。教师的任务是通过触及学生灵魂的教育，唤醒学生的良知良能。

□ 陈有勇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教育界，存在着一些“有文凭没文化，受教育没教养”的现象。为什么社会经济在发展，人的受教育程度在提升，而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却不容乐观呢？这是当下许多人应该反思的问题。

## 唤醒受教育者的良知良能

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唤醒受教育者的良知良能，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早就对这一命题作了阐述。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并不认为自己什么都懂，相反，他认为自己在很多方面是无知的。他自己说：“我很有知识吗？我没有太多知识。有一个庄稼人问我问题，我一点儿也答不上来。我的办法是从他所提的问题正反两方面来追问，一步步问到底，得到答案后尽量告诉他。”孔子是通过一步步追问以后，明白了别人问的问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再告诉他。这就启示我们，教育不是老师把一个现成的答案塞给学生，而是启发学生自己找出答案。不是老师有一个宝藏，强行塞给学生，而是发掘出学生自己内在的宝藏。

不仅中国的古圣先贤有这样的观点，西方国家的智者也很早就有了这种观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甚至认为，学习就是回忆，老师的任务就是启发出本来就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曼诺篇》中记载：苏格拉底做了一个实验，通过适当的提问，便使从未学过数学的童奴知道如何计算正方形面积，知道两个正方形的面积之比等于他们边长平方之比。这里，柏拉图认为我们的知识不是后天被人给予的，而是深藏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但处于潜在的迷蒙状态。老师教给学生很多知识，最终还是要学生自己理解领悟，并能灵活运用。老师告诉学生很多做人的道理，最终也得靠学生自己在生活实践中去体会、去提升。其实，教育的目的就是唤醒潜藏于我们内在的知识教育，就是要唤醒受教育者内在的良知良能，是唤醒孩子内心对知识的热爱，唤醒孩子内心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理解。

## 唤醒受教育者的道德自律意识

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促使学生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培养国家未来人才的重大使命。老师的职业不是给学生注入灵魂，因为每个学生本身就有灵魂，有个性。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唤醒来触及学生灵魂的教育。

人是一个追求自身完善的个体，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所谓：“仁者人也”，“仁”首先要求每个人成其为人，成为一个健全有为的人。在这里正如康德所倡导的那样，人不是手段，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且，实现人自身的完善主要不是靠外在的规范，而是靠内在的自觉性，强调的是内在的超越。现在我们的教育不那么重视学生人格培养，思想品德作为副科，老师和家长都不太重视。然而，孝顺、友爱、诚信等基本品质，在年龄小的时候更容易培育。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加强学生成才能力的培养，更要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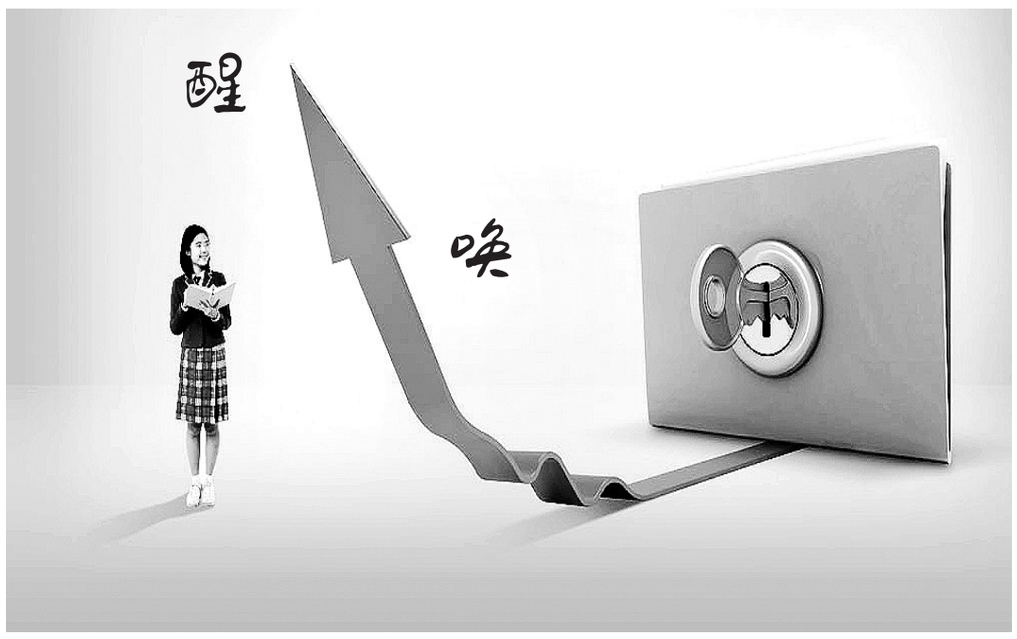
教育的目的既然是唤醒，那就一定要注意采用个性化的唤醒方式。学校不是工厂，不是用来生产成批量、标准化的商品。学校是花园，要根据各种花草的特性，进行施肥浇水。所以，个性化的教育方式很重要。老师看到每个学生的潜质，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引导学生发展各方面才能。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从而成就学生的健全人格。

## 唤醒受教育者的问题意识

怎么激发受教育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呢？让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是关键。在学生有了问题之后，老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自主研究，切忌代替学生去思考、去研究。老师给学生讲出一个道理后，要引导学生推导出类似的三个道理，这就是“举一反三”的教育方法。

在现实的教育中，对受教育者的激励要更多地使用“问题激励”，用一个又一个问题去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问题是学习的第一动力，一定要唤起学生的问题意识。一个没有问题，不会自我思考的学生是不会有自己的创见的。现在的家长习惯于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措施，考试考得好就给物质和精神奖励，考得不好就骂孩子甚至打孩子。很多孩子对网络游戏很痴迷，网络游戏不能给他带来现实的“胡萝卜”，也没有“大棒”的威胁，但孩子就是沉迷其中，这是因为游戏中有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等着他解决。这里，就是问题在诱导孩子，是攻克难关、解决问题的乐趣在诱导着他。老师和家长需要做的是如何把学习的过程变成一个又一个富有挑战性但又可以攻克的问题，引导孩子进入找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真正学习状态。

教育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它需要用心去做，用爱去做。教育是全民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目的进行深入思考。真正去唤醒受教育的良知良能，培养出人格健全且有研究能力的人才。




文化随笔

# 古村落民居的文化蕴含

古村落集文化、艺术、物质和精神文明于一体，保持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以及文化遗存，是地域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 陈旭峰

浙江省的古村落资源非常丰富，众多的古村落分布在浙江省内各地，这些古村落集文化、艺术、物质和精神文明于一体，保持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以及文化遗存，是地域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浙江古村落民居有着强调“天人合一”理念、突出血缘宗族观念、注重人伦和礼制等诸多文化蕴含。

“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这一理念首先由庄子提出，《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后来经过汉代儒学思想家董仲舒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体系。浙江古村落民居受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村落位置的选择非常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天人合一”，还表现在民居建筑的整体布局和形态非常强调“天人合一”。从“天人合一”理念对村落位置选择的影响来看，古人们认为，如果民居建筑的布局和形态背离了“天人合一”，那么村落的兴旺和繁荣势必会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古人们对于“天人合一”理念有着非常强的敬畏之心。

传统古村落“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典型的血缘宗族相聚而居的聚合体。浙江的古村落往往有着浓厚的“聚族而居”特征，因此，血缘宗族对古村落民居的规划和建筑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祠堂对民居布局的影响就能很好地反映出来。从完整的体系来说，祠堂可以分为“宗祠”“支祠”与“家祠”三种类型。“宗祠”是同一宗族的祭祖、议事场所，也是整个村落的中心；“支祠”是同一支脉繁衍的后代祭祀祖先和婚丧嫁娶的公共场所；“家祠”是同一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是一个家族的中心所在。从“宗祠”到“支祠”再到“家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血缘宗族关系体系，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布局体系。古村落的建筑布局并不是散乱无序的，而是按照宗族中不同的房派，以宗祠为中心聚落而成的。

浙江古村落民居突出血缘宗族观念的特性不仅可以通过以宗祠为中心的布局特征反映出来，有的还能够通过建筑之间的有形联系反映出来。例如，绍兴崇仁古镇以玉山公祠为中心，周边分布着一座又一座的老台门，台门之间用跨街楼勾连，这使得这些老台门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有家族的聚合性。五联台门是崇仁现存最具特色的台门建筑群，五联台门是明代晚期开始建造，至清代中期最后形成的建筑群，由大夫第台门、樵溪台门、老屋台门、静轩台门、云和台门、翰平台门等组成。各台门既保持独立的布局，但底层有边门，楼上有过街楼与旁边的台门相连通。五联台门非常好地反映出了古人“分户合族、聚只一家”的深刻文化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是非常注重人伦和礼制的，这在浙江古村落民居中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反映。在中国传统的人伦礼制中，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内容的“三纲”是最根本的道德规范。“三纲”在古村落民居中有着非常好的反映。在民居的室内布局上，厅堂位于民居的中心位置，厅堂两侧则为厢房，是主人和家庭中心居住生活之场所。以宁波的民居为例，宁波民居呈现出H型布局格局，位于民居中心的是祭祀祖先的堂前，堂前采用格扇门，规格较高，方便拆卸，在祭祀时可变成半开放的空间。卧室等其他房间必须以堂前作为中心进行布局，这种民居的布局格局充分反映出了祖先至上的等级和秩序观念。

此外，古代统治阶级对建筑的等级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唐六典》卷二十三记有“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建筑等级制发展到后来，更是形成了法律，用法律手段强制实施。例如，《唐律》规定，对建舍违令之人，杖一百，并强行拆改之。因此，古代建筑的规格是要根据主人的身份而定的。以金华兰溪诸葛村的丞相祠堂为例，因为诸葛亮曾经是蜀国的丞相，因此其建筑的规格是很高的。丞相祠堂由门屋、两侧廊庭和后面供奉诸葛亮和“功宗德祖”神主的享堂三部分，共同组成一个“口”字形平面，在“口”字中间又建起一座高大华丽的方形“中庭”。丞相祠堂的门屋及“享堂”均为五开间，甚至还造了钟楼和鼓楼。由此可见，古代建筑的规格是与主人的社会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建筑规格同样是传统礼制的重要表现形式。

# “青春气象”的审美特征

□ 嵇绍玉

书法中的“青春气象”，是指审美情境中，书法作品散发或让观赏者感受到丰富而热忱的向往，即使颓唐忧郁也仍然闪烁自由和欢乐的憧憬，含有不拘俗态、没有约束、鬼斧天成的美妙奇异，含有浪漫、飘逸、开朗、率真的心路风景，含有对生活自信、高放、傲视和倜傥的蓬勃和专注。总之，就如同一个妙龄的少男少女，有着极端新鲜和旺盛的生命力。“天然”“俊逸”“兴会”和“简约”成为其最重要的建构元素。

“天然”，是“青春气象”最明显的特征，它本与滞碍、雕饰相对，无滞碍则可直书胸臆，无雕饰则可从心所欲。六朝时期特别重视艺术的天然自成，此时的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庾肩吾《书品》、姚最《续画品》等文艺批评专著，都强调要秉持这种审美方式。而所谓“天然”，意即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和宋严羽《景德传灯录》所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指作品中匪夷所思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某种情思内涵，没有形式方面刻意加上去的成分，但达到自然而成的艺术效果。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写道：“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直，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常作此书，翼是种繇第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见繇，即潜心改迹。”就是提醒人们要去掉人为制作的用意。明董其昌《论用笔》所说“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故为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书，谓说定法也”。也是来说明，艺术要通过“天然”的形式来表现无限的精神内涵。正是这一点，提供了书法艺术“青春”气象形成的基础和必备条件。

“俊逸”，此词最早出自《后汉书·袁绍传》中《讨曹操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意思指才智高超出群。“俊”，本是指人丰姿俊秀、容貌秀美的意思。“逸”，本指“逸民”，三国何晏《集解》注曰：“逸民者，节行超逸也。”有超群之意。钟嵘《诗品》称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又称其“贵尚巧似”，因为他善“形状”，善“写物”，所以也就能得物之精彩，整个诗作也就显得非常美。在美学范畴上，“俊逸”与审美特殊形式“优美”相通相近，有伶俐、雅洁、漂亮之意。“俊逸”同样有形式和内质之分，王羲之《用笔赋》认为字体须“藏骨抱筋，含文包质”，王僧虔《笔意赞》要使字“骨丰肉润，入妙通灵；努如植槊，勒若横钉”。这里的“文”和“润”是指形式。王僧虔《论书》在论述张芝、索靖、韦诞、二卫等书家后，提出“并得名前代”的原因时指出：“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绝耳。”“笔力惊绝”就是指“俊逸”的内质。清成亲王的书法，形式上，横画纤细，竖画较粗，有流便妍艳之形，而内质上，遒劲婉丽，有潇洒隽越之韵，“青春”的风姿都跃然纸上。

“兴会”是一个艺术中的抽象概念。明周公瑾在《印说》中说明，“兴之为物也无形，其勃发也莫御，兴不高则百务俱不能快意”，兴趣高时，“时或宾朋浓话，倏而成章，半夜梦回，跃起落笔，忽然偶然而不知其然”。但求兴致，“即规矩未遑，譬如渔歌樵唱，虽罕节奏，而神情畅满，不失为上乘之物”。即时“兴会”的创作体会，对绝大多数的书者来说都曾有过。唐孙过庭在书法理论上提出的“偶然欲书”，以及清张问陶《船山诗草》时所指的创作冲动“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云散如烟”一脉相承，即是此意。但“兴会”并不是涂鸦随试，而要在掌控高超的技艺基础之上，一如张南本画火，瞑目七日夜，又如蔡邕学书，入嵩山得素书读诵三年才落笔。我们不可随意说唐张旭大醉后兴会下笔挥洒，他的所兴所会缘于他的深厚学识，正如他自己在《颠书帖》指出：“颠书之趣，所贵者日复当，异与足下颠草，必有奇势。所将委曲及船取米，必定知减于石雄逸。”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他：“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建立在艺术的高度自觉与领悟之上的“兴会”，才类似于青春的冲动，创造出浪漫挥洒、热情奔放、狂逸宏博的艺术之美。

“简约”，与孔子《论语》中的“微言大义”同义。刘勰《文心雕龙》里说：“虽精义曲微，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书家们早就意识到“简约”的审美力量，传说的伏羲画八卦以最简捷的线条概括出宇宙的万有。儒家经典之作《易传》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简约思想，其中的“刚健、笃实、辉光”就反映出简约之美。汉刘向在《说苑》中记载孔子话：“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表明艺术必须追求简朴素雅的风格。唐怀素是追求简约之风的典范，他的草书线条，根根圆劲有力，使转如环，一气呵成，同时结字也十分简练。当然这也与他禅修苦寒的简约生活有很大关系。清刘熙载《艺概》“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及无余，始显以明指要乎？”极好地阐述了以简约的线条，来创造出丰富的书法艺术形象，并进而创造出“气韵生动”“境界为上”的高级审美体验。

艺术揽胜

# 德法不二

□ 李文文

每个文明都有它独有的特性，本质上表现在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中华文明讲求“一以贯之”，孔子多次言“吾道一以贯之”，老子言“道生一”。所谓“一”，说到底就是以系统的思维、整体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比如，我们的先人重视德治体系，今人心存疑问，到底是“德”重要还是“法”重要？重视“德”会不会忽视“法”？其实，这样的问题一出口就很是“二”，二元对立的思维使得很多人无法接近真相。唯有穿越“二”，洞达“一”，许多问题将不解自消。反此，当问题本身成为问题的时候，永远也无法求得正解。德治的本质是“德法不二”，“德”与“法”一以贯之，但是，引导不同，结果全然不同。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孔子看来：政令、刑罚、美德、礼制共同构成政治治理的有机体，每一方面都不可或缺。但是，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以“政令、刑罚”为主抓手，还是以“德、礼”为主旋律，实在是有所不同。当领导者失去威严之时，就只有动用威胁。民众会执行但不一定服气，由此便留下祸患。而以刑来防奸，如老子所言“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判”。禁忌愈多，叛逆之心愈重。纵然是威慑于刑罚，但民心弥乱，投机取巧，罕有知耻之心，自然是防不胜防。

看来，惩恶不是终极目的，劝善才是至高追求。所以，换一个旋律，以道德来引导，以礼义来规范，在人们的内心建立一道屏障，分清是非荣辱，从不敢做坏事，到不想做坏事，生发守法的自觉，才是王道的根基。

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先人不仅有想法，更有细致系统的举措。根据德的要求，“立言垂法”，于是就有了礼法，成为布量为政之方的天秤、绳墨、规矩所在。有了这套系统的礼法在，所有的事情都一目了然，表现在方方面面，《礼记》中多有记载，比如“职官、班爵、授禄构成的官僚等级体系；土地制度、关税制度、行政区划制度、刑律体系、朝觐制度、祭祀制度、自然保护制度、丧祭制度、学校养老制度即传统所谓的典章制度”。因此，人们做事得体，政事顺利施行。

读得儒家文化的真精神，将必然体察到它源于生活的场域，本于人心与人性，基于生命面向生活最优化的考虑，提出最可行之路径。用今天的话来表达，自始至终它都以稳健的方式把握着整个社会运行的航向，致力于实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经典今读